

■ 书评

# 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评谢友义报告文学新作《肝胆两昆仑》 □王俊康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一重大时间节点上，作家谢友义报告文学新作《肝胆两昆仑》顺利出版。他满怀激情地在书中写下家乡广东紫金杰出代表人物刘琴西、刘尔崧兄弟的红色传奇。

## 展现“一门双烈”的革命事迹

刘琴西是中国最早的红色政权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紫金“四二六”暴动总指挥，其弟弟刘尔崧是中国共产党初期最早一批50多名党员之一，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波澜壮阔的斗争岁月里，白色恐怖笼罩上空，但刘氏兄弟慷慨无畏、义无反顾，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豪气与铮铮铁骨，让人真切感受到巍巍昆仑般的浩然正气。

《肝胆两昆仑》作为一部红色传奇报告文学作品，其底色是忠实于历史的。谢友义在两年艰辛的采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专访先烈后人，请教不少文史学者和党史、工运史专家，还在书中敬录了两位先烈革命活动大事年表，以备检索。在写作全过程中，作者“不断地质疑，不断地惶惑，不断地自我否定”，以求写出“最接近真实”的刘氏兄弟。

刘尔崧于1927年4月19日被反动派在珠江白鹅潭秘密杀害，年仅28岁；哥哥刘琴西于1933年在广州黄埔港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37岁。革命风云依然散去，英烈美名载入史册，如何从尘封已久的文史档案资料中，抖去厚重的尘埃，再现栩栩如生的风云人物，来激励后人砥砺前行？如何让大漠凛然的英烈“起死回生”，把革命的火把传递给新时代奋进的人们，去照亮中国梦的前进道路？

不可否认，党史讲义和资料汇编一样有着不可替代的认知作用和教化功能，但文学作品却有着更为广阔、更为深刻、更为动情的审美功能。

谢友义与刘氏兄弟同是广东紫金人。作者从小耳濡目染革命先行者的英雄事迹，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崇拜和刻骨铭心的敬仰。尽管作者已在文学创作方面颇有建树，但当他执笔书写《肝胆两昆仑》时，依然会不断叩问自己：“他们的生命是那么的生机勃勃气血充盈昂扬，我可写出了他们的十之一二了吗？”不忘初心，牢记文学使命，这是谢友义写作的原初动机。

## 报告文学激活尘封史料

报告文学是一种嫁接文体，由报告和文学两部分组成，但却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有机融合

在一起的。报告是一种逻辑思维的产物，它必须忠实无误地把消息、通讯等诉诸于读者，真实是报告的生命；而文学却是形象思维艺术，它可以想象虚构，可以形容夸张。

该书分上、下两篇专题，上篇为《刘琴西：中国最早的红色政权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下篇为《刘尔崧：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上、下两篇分别围绕两兄弟的生平、革命经历展开叙事，将两兄弟的主要事迹分开来写，又在各自的部分有所交叉，主次分明、逻辑清晰，详细地再现了两位革命先驱的英雄岁月，反映了革命先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前赴后继的大无畏气概。

与此同时，作者将诸多文学元素融入到“报告”中。前言中，作者开门见山、直抒胸臆，字里行间充满诗情画意，由衷褒美家乡英雄。前言的最后一段虽然只有两行字，却把读者思绪牵向远方，“封笔之时，我再次回到家乡紫金，一夜山雨未停歇，此时推窗望出去，这生我养我，蓊郁苍茫的紫金山，放晴后有另一种壮阔辽远。”读来，意味深长。

全书题记文字隽永俏丽，上篇题记十二则，下篇题记十则。

“他转身离去时，留给汕尾老百姓的背影就是一项草席，一只藤箱，一对木屐。他的头顶没有圣人的光环，却有一片明净如洗的苍穹。这就是共产党人刘琴西一身正气，两种清风。”（上篇《周恩来左右的左右手，老百姓的刘青天》）

“患难相扶，生死与共以青春之名相聚，以革命之名奋进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奔跑在理想的路上，回头有精彩的故事，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明亮的远方。”（下篇《学运：以青春之名相聚，以革命之名奋进》）

题记置于一篇之首，具有导读作用。这些言简意赅、富有审美功能的导读，配合书中大量史实出现，它们或提纲挈领、或意韵悠长，或哲理释放，作者用散文笔触尽抒情怀。

报告文学《肝胆两昆仑》的创作难点在于，写作时不可能与书中人物面对面进行深入访谈，更缺少当年的影像资料，所以在人物形象的描摹方面，给作者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诸如行为动作、生活状态、语言、性格，还有人物心理细节刻画描写，这些都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报告文学需要在事实真实的基础上，搭建一个合理想象的自由空间，要求表述合情合理，经得起推敲。作者若能在此方面多加思考，作品会更加精彩。

# 晚明审美风格何以现代

□ 妥佳宁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五四与晚清之争，由来已久。除了众多坚持五四起点说的学者外，大陆学者中如严家炎、杨联芬等，与海外学者王德威等，于不同时间不同语境下都注意到了晚清文学的意义。而学界近年来又大有将晚清文学所谓现代性追溯至晚明的势头，哈佛版《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就从1635年写起。而妥建清的新著《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一书，则干脆将中国本土现代性的源头直接追溯到晚明的颓废审美风格。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问后，又进一步质问“没有晚明，何来晚清”。该书对晚明的颓废审美风格从诸多层面展开了论述，是在此方面迄今所见最着力者。然而，晚明的颓废审美风格，究竟何以现代？

如果细察国内学者严家炎、杨联芬和海外学者王德威的论述逻辑，即可发现双方论证晚清的重点完全不同。严家炎、杨联芬等国内学者对晚清文学的重新发掘，正是看重晚清文学中的“新”，所重点讨论的议题多是晚清文学之“新”对五四文学之“新”的影响。试图对其中“新”为特质的“现代性”，作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考察。而王德威等海外学者对晚清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的重新“拯救”，则恰是看到在梁启超所谓“新小说”之外还有大量晚清小说并不符合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标准，却可视为中国文学所谓本土“现代性”的萌发。简言之，国内学者更倾向于从五四出发，去寻找晚清的五四特质；而海外学者则是在西方学界的压力下，有意探寻晚清比五四具有更多可能性的本土特质。在五四之前，晚清的梁启超之所以提倡“新小说”，正是因为这些“新”的小说根本不足以实现他在“群治”层面的目的。而五四一代尤其是鲁迅等人对师辈中如梁启超等的“不够意思”，或许不乏意大炎、梁启超及派系斗争的影子，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说没有“影响的焦虑”。即晚清“新小说”与五四现代性的密切关系，无论五四诸人承认与否，始终难以抹除；而那些晚清不“新”的小说之颓废，显然与五四现代性并非单纯一致的关系。

那么，比晚清更早的晚明，其颓废审美风格何以成为一个足以与五四放在一起讨论的话题呢？在妥建清的梳理与考证中，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都曾追溯晚明文学的意义。在五四文学诸位开创者之中，周作人对晚明文学意义的强调最为突出。1932年2月15日至4月28日，周作人应沈兼士之约，先后八次前往辅仁大学演讲，演讲稿经修订编印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认为古今文学始终在“载道”与“言志”之间左右流

转，晚明散文（公安派、竟陵派）言己之志，清新流利；清代八股文与桐城派散文则背离此道；五四新文学是对清代“载道”文学的反动，也是晚明“言志”文风的复归（同时又有西方影响）。故而，在周作人的论述中，“言志”文学才是值得肯定的，“载道”文学则不足道。中国文学在“言志”和“载道”之间做钟摆式的往返，晚明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相通。

暂且不考虑五四文学是否纯粹“言志”，晚明文学的颓废审美风格本身，又是否具有某种现代性呢？妥建清的新著正文试图解答这一问题，全书对“颓废”的把握并未陷入简单的道德品评，而是以审美的维度透视“颓废”的文化现象，并试图对单一化的道德品评模式提出挑战。这或许是此书对晚明之“颓废”把握最准确之处。而这只是讨论“颓废”问题的基本前提，并非关键所在。

“颓废”之最大意义，恰恰在道德层面。如果抛开道德而单纯从审美层面讨论“颓废”，可谓舍本求末。妥建清新著的意义，绝不在于其试图从审美层面来把握晚明之“颓废”，而在于晚明“颓废”本身就是对既往道德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挑战。假如晚明之“颓废”真的具有某种“现代”的可能性，其唯一可能之处，就在于此。作为一部规范的学术著作，《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是严谨细致的；而相较于其所研究的晚明“狂人”“堕客”们，今天的学术著作显然不及前人之放诞——这一评价，既是对现有学术体系的质疑，也是对学术研究中客观态度的肯定。换言之，今天在诸多层面固然已经超越了晚明，可今天要用纯粹的学术话语来叙述晚明之“颓废”，其力量仍不及杂文（由此也可明白周作人当年《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何舍严谨而取暗讽）。

晚明之“颓废”，是一种对既有精神秩序的消极抵抗。该不该质疑并反抗，关键在于既有精神秩序本身是否合理，究竟是由哪一个阶层为了维护何种利益而制定，并以隐身的意识形态手段在社会各个层面潜移默化地推广。晚明以前的主流社会思想，大多有意无意地维护着既有精神秩序，而较少对其合理性展开反思。在历代重重叠叠的维护与纵容之下，既有精神秩序逐步失去了维护被统治阶层基本利益和精神诉求的应然功能，在现实层面上，几乎彻底沦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工具。然而传统社会究竟有多少思潮曾大胆质疑反抗甚或仅仅触及这种既有精神秩序的合法性根基？大多数人并未甄别并思考实然与应然的区别，而往往在实然的重压之下被迫甚至“自主”地低下了头。如《孟子·尽心篇》中最著名的“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语，就是先秦时代思想者对诸如“霸道”之类的统治秩序提出的大胆反抗与批判。可这样的《孟子》精髓，在明初专制集权鼎盛的大太祖治下，竟被朱元璋删去，被删多达数十处，且不许孟子陪祀孔庙。足见那些对既有秩序加以质疑反抗的声音，不可能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统治时代真正获得传播机会的。即便是被一度“篡夺”中原王朝正统的异族统治者元文宗封为“亚圣”的孟子，回到自命更为正统的明太祖御笔朱“批”之下，也难逃文字狱。故而对既有精神秩序的大胆反抗，既是思想者个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也是时代环境的造就使然，两者缺一不可。当然，越是在威权统治走向极端的时代，越能激发精神独立的思想者对不合理的现状进行反思；可只有在一个具备某种松动威权统治根基可能性的时代，思想者个体对既有精神秩序合法性的质疑与反抗，才能有效地发展为一种社会思潮。反之，任何原本特立独行反抗者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歪曲利用之下，都有可能被重塑为维护既有精神秩序的符号。具有反抗精神的思想者并非思想史上的常胜将军，反倒是多在当时以身败名裂的方式被公众所知，死后又被历代“谰托知己”者加以利用改造，乃至面目全非。而在这样的屡败屡战之中，仍然不乏一代又一代新的思想者出现，对既有精神秩序不断提出反抗，直到整个时代的思潮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允许其思想重新还原并真正传播。无论晚明“颓废”的这种抵抗是否最终引向所谓“现代性”，抵抗本身才是其根本意义所在。可惜的是，晚明这种所谓的抵抗，仍然是以逃避为主，绝少迎面反抗。不能说李贽等人对既有精神秩序的挑战不够猛烈，但纵观晚明，究竟有几个李贽？更多的是像李渔和公安三袁那样，以颓废的审美风格来代换正襟危坐的道德评价体系，而无力直接对既有精神秩序发起猛烈的抨击。

或许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展现了其学术思考的严谨。全书对晚明之“颓废”的整体把握，并不像周作人那样为抵抗今日之“载道”而刻意强调晚明之“言志”，亦不像王德威以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小说的情欲模式来论述“世纪末”的晚清，而是紧扣审美风格来把握晚明之“颓废”，而又不失其“去道德化”特征。当今出于各自意图不断在现实重塑晚明之时，当以五四现代性来想象晚明而又发现晚明并不如所想那样符合“标准”的“现代”之时，甚至当各种对重塑的还原也不乏特定意图之时，严谨的学术研究自会体现其客观性。而这也是在杂文之外尚有学术研究存在的意义。

## ■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薛凤旋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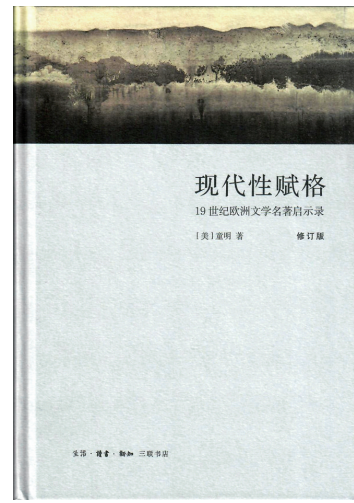
这本关于中国城市文明形态的兴起和演变的著作，出自一位具有地理学专业背景的香港学者之手。按照书后所附的“出版后记”介绍，“本书是薛凤旋先生积三十年教研经验而写就的心血之作”。可能也正因为依托了来自教学现场的讲义一类的素材，整本书的篇章架构举重若轻，讲述方式要言不烦。虽然内容涵盖甚广，并且学术性很强，但即使是非专业的一般读者，读来也不会有特别艰难艰涩之感。

全书十三章，依时序分述中国城市文明发展的各个关键阶段。开篇介绍的，是根据考古发现归结出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晚期的“初城”聚落及随后的龙山城邦的情形。继之，则展现和阐释夏商周三代，严格体现礼乐观念和宗法关系的“封建制”城市，是如何向容纳工商业及其附属社会阶层的中央集权制城市发生转变的。紧接着的两章，勾勒了从秦汉400多年间功能和格局臻于完备、发达的行政型城市，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崛起的全国性的核心城市区和海港城市，这一演进过程的基本线索。

第九、十章集中梳理宋元明的城市变迁。两宋时代，在城市经济和市民社会的促动下，行政型城市全面转型为商贸、娱乐型城市，南方沿江、沿海地区城市蓬勃兴起，城乡分离显著加剧。但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主流价值的地位和商业文明以至科技的发展，一度并行不悖。进入元代，城市化进程陷于黑暗的低潮期。北方衰落、人口流失，城市的数目和人口规模急剧减少，商业也遭遇阻碍和限制而未能达到两宋水平。唯海运、漕运和丝路沿线的城市有所扩展。

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整体上依照《考工记》的原则，北城墙开门等局部细节也采纳了某些道教规矩，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大都。但大都的市场数量和

《现代性赋格》，【美】董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出版



代意识注入希腊悲剧的美学智慧。”但是，这些从今天看来颇具先见之明的批判性思考，在它们公之于世的很长时期里，却一直被当作开历史倒车的异端邪说、逆时代潮流而动的非理性谬论。

走到了时代前面的这几位现代性症候的预见者，表现在思想取向和写作风格上的具体姿态其实并不一致。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置身怎样的思想立场和认识起点上，都没有局限在偏执一端理性判断、道德判断或政治判断之中，以至昧于审视人性和社会更为复杂的面相，而是顽强地保留和发扬了对人性的复杂体察更深、把握更准的审美判断的能力。合观之下，一方面，这正显现出现代性自身多意、多声、复调的特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已经在迸发后现代思辨的元理论光彩。由此，作者特别阐发了他的一个判断：“后现代性还是在谈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对启蒙体系现代性的后见之明。针对体系现代性的后现代性，不是另立体系，而是不事体系，在历史、变化、新语言认识的更大格局中，继续寻求启蒙之词，继续启蒙。用当代思辨理论的另一术语，‘后现代性’可称作‘对现代性’。”

所谓“现代性赋格”，作者在修订版序里自陈，是借用“赋格”这一本意为复调位作曲的音乐概念，来比喻现代性的复调。而现代性，在作者的理解中，又是欧洲启蒙思想家在变革的激情下对未来提出的理想蓝图。这一蓝图的设计，依据了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传统，拼接组合了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提出的关于理性、主体、知识和历史、世界、科学的各种看法，形成一个宏大体系，可谓之体系化现代性或现代体系。它否定了以宗教信仰为特征的旧世界观，推崇科学、理性和平等的新价值，把创造出一个自由、幸福、没有残害的世界作为宗旨。但与此同时，它也导向了片面的直线历史观、“科学主义”式的新宗教和过于低估人性复杂程度的工具理性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严重偏颇。

恰如书名副题“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所示，这本书选取了4位19世纪欧洲文学经典大师的作品展开细读和引申讨论，从而表明：在现代性成型的过程中，已经蕴含了针对现代性本身的深切思辨。“波德莱尔以‘忧郁’诗风表达‘理想’，回应第二帝国奥斯曼式的现代化；福楼拜以‘客观’小说风格鞭挞布尔乔亚并讽刺宏大叙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地下人之口，剖析工具理性如何导致背离人性的乌托邦；尼采从苏格拉底如何如何将科学与哲学对立着手，梳理整个西方思想史，并为现

规模都逊色于唐宋都城，全城人口最多时仅为50万，且仅限约2000名色目商人从事商贸。到了明代，由政府主导，对全国城市进行层级分明的恢复性建设。人口逾百万和数十万的大城市，与千百户人口的中小市镇，以及北方长城沿线的“镇”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卫”“所”等军事为主、商贸为辅的新型城市，构成错落多样的城市布局。书中第十一章在“由新儒学到半殖民地”的主题下，对清朝的城市化进行总结和审视。清代接受了明代城市全国四分的空间分布。国都北京、贸易和轻工业中心苏州、长江航运中心汉口、制铁和瓷器重镇佛山，为四大都会。四大都会加上南京、杭州两大丝织和商贸中心，以及对外通商口岸广州、漕运和商贸中心扬州，为八大工商城市。此外，每年承担全国五分之一粮食运输和一半出口丝绸运输的沿大运河城市，景德镇、宜兴、德化这三座瓷器手工业重镇，也作为两类特殊城市看待。在这样的城市布局中，自宋以后，接纳了商业、贸易和边缘地区的新儒学的城市理念底色（其核心思想是“以民为本”，其行政功能是通过城市来为周边农业地区提供中地服务），仍然清晰可见。但清后期由于外国列强的军事侵入和强迫开放，大片沿海、沿江地区沦为半殖民地化的城市，维系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城市化格局就此趋于复杂和瓦解。众所周知，由此所致的种种复杂困局的根除和改善，推移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此，全书压轴的两章分别做了史实分析和理论探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改革开放前中国究竟是走了一段“反城市文明”和“非城市化”的道路，还是推行了利用城市化来促进工业化的政策等问题的明辨。作者认定，后者才是事实。新中国的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是以经济和政治共存为立足点的。基于此，新中国的城市化政策，致力于消除以往将现代产业过分集中在沿海条约港的空间分布不合理因素，使新建的工业城市分布更均衡，更贴近主要原料产地所在的内陆省份，也更合乎国家安全的要求。同时，也将严重剥削性的消费型城市大力改造为生产型城市和工业中心，使城市朝着有利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和脑力劳动差别、工业和农业差别）的方向发展。在文化和政治上，城市的属性应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